

新时代的 文史研究

谢 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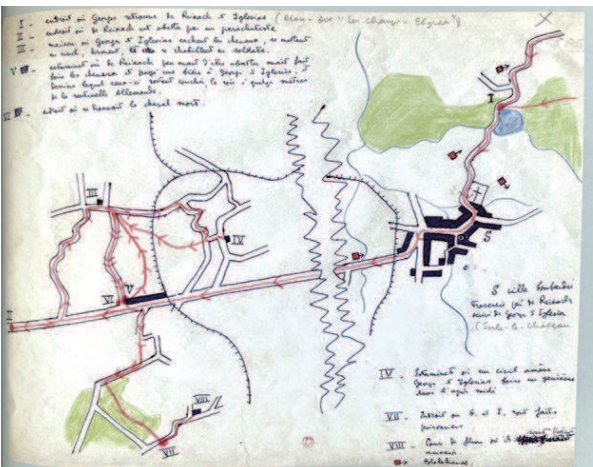
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原先记忆中存了的问题，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发生联想，再去检索，然后解决。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语词，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

文史工作还是原始阅读为上，早年记忆优先，电子检索靠后，通过机器产生的发现乐趣，对记忆和联想力的要求相对较低。敦煌卷子发现后，王国维他们因为有早年深厚的知识基础，一看就能与过去的记忆建立关系，很快就有了新的发现。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的“二重证据”经验，就是早年记忆的旧知识和新出史料会面。

近年中国文史研究中，辑佚工作的收获很多，中国现代文学尤甚，但我们都知道，其中的许多工作是通过机器来的，不是读书多见识广的结果。文史研究，毕竟是智力活动，过去文人学者，多有呈才炫博毛病，陈寅恪、钱锺书也不例外，这固然是特殊偏好，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过程

在读到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1913-2005）的《弗兰德公路》之前，《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中弹仰望“高邈的天空”这一段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不仅仅是其惨烈的暴力和荒诞，更是因为那短促的一瞬改变了人物的成长轨迹：曾经向往功勋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看着天上的流云，突然意识到了万事皆空。“咔”地一下，仿佛就如德勒兹所说，“时间脱离了它的铰链”。同样的断裂声响彻《弗兰德公路》。这部讲述1940年法军在法比边境的弗兰德地区遭遇德国装甲师重创的战争小说实际上讲述的是主人公所经历的从懵懂天真到幻想破灭直至幡然醒悟的过程。当然，这也是西蒙自己的故事，他的人生就在1940年5月16日的春光灿烂中，在那条因为不知道如何称呼所以只被称作“弗兰德公路”的乡间小道上只被改写。

西蒙生于1913年，算是半个贵族子弟，其母家先人让-皮埃尔·拉孔布·圣米歇尔曾官至拿破仑麾下远征西班牙的大将军。他幼失怙恃，父亲在他不满周岁之时在一战中阵亡，母亲在他十二岁时患癌去世。作为孤儿，西蒙自小在家族中备受怜爱，从



西蒙手绘的弗兰德公路行军路线

中展现的智力乐趣，文史知识要瞬间联想和脱口而出才有意思，翻手机最便捷，也能解决问题，但无趣味。

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

网络时代，机器瞬间能找到的史料，严格说就不是史料，是现成知识，现成知识只能是解决新问题的辅助史料，其间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术，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学者的趣味，文史研究应当考据优先，诠释靠后，考据的生命力长久，诠释则见仁见智。史料新旧虽是个相对问题，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问题前提下才产生，能开新局面的学者多是直接阅读文献，在阅读过程中遇到了难点，再去寻求机器解决。

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学者，总能长篇大论，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长篇大论和高头讲章，总是要在别人已见史料或者原创结果上的延伸，如果别人不开这条路，他们便不知世上还有这条途径，他们只会顺着讲，或反着讲，而不能从头讲，不能破题。不能开新领域，自然也就谈不到原创力。陈寅恪研究《再生缘》，结论对错不重要，但他能发现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这就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如果没有他的工作，后来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会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才会有，《柳如是别传》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愿意把精力放在这方面，这就是远大的眼光，他是个盲人，还能做这样的研究，可见早年记忆和联想力是如何的发达。近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宝卷研究很热，但这个工作的第一功要记在郑振铎头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宝卷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后来的研究，严格说都是在他的基础上才有的。现在写本研究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机器时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为凡印本在逻辑上都不可能具有唯一性，无论是雕版印刷、珂罗版、石印或现代印刷，而写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况下少量钞本例外），印本最适合机器时代的检索，而写本（正式钞本或民间钞本）在未经研究者重视前，不可能使用机器检索，所以写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须最早发现原钞本，进入图书馆和收藏机构的钞本逻辑上均有记录，有记录的东西对机器来说都不是问题，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则在发现，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钞本，如古代戏曲、古代小说、宝卷、杂字、蒙书、契约及其他民间文书等等，如果研究者能将眼光投向这些未经注意的东西，才会产生知识增量，才是有意义的学术积累。

机器时代，靠检索辑佚，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它让传统文史研究的趣味大为减少，这也是个问题，所以我一向的认识是顶级作家才辑佚，普通作家多数没有必要专门辑佚，应当取“大年三十逮个兔子”的态度，阅读过程中遇到了，随手解决就好，不必专门刻意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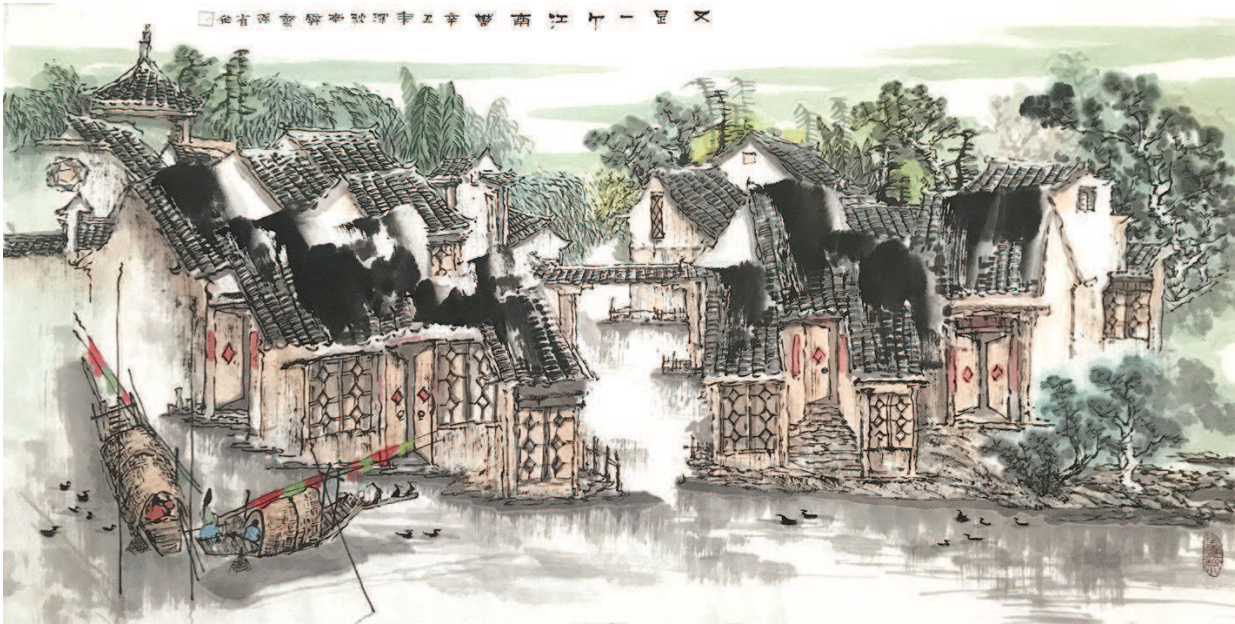
在国内，以个人名义命名的美术馆并不多，而水乡昆山却有两座。一座在有千年历史的古镇锦溪，叫张省美术馆；另一座在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神州水乡第一镇”的甬直，叫张省艺术馆。锦溪是张省生于斯、育于斯的故乡。新世纪初，锦溪镇政府投资300万元，富有水乡特色的美术馆孕育而生。用直的张省艺术馆，是一幢3500平方米的三层建筑，由甬直镇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于2014年建成。两馆都收藏并展示张省捐赠的不同时期的书画代表作及藏品。由当地政府出资建造美术馆、艺术馆，对一名画家来说，自然是无上的荣耀。

认识张省已有30多年了，彼时是“小张”，风华正茂的年龄。身材颀长，英俊潇洒，说话不紧不慢，吴侬软语伴着儒雅的笑容，放着光彩的眸子透出的真诚，使人瞬间认定这是一位值得交往的朋友。

当年，张省在轻工局做设计工作，还不是一名专业画家。如诗如画的水乡美景和浓郁的文化气息，赋予他一种与生俱来的绘画秉赋。他游走于水乡古镇、村落、河流、小桥……采风写生，积累素材；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从张继馨、陈大羽、钱君匋、刘海粟等前辈大师，向他们求教写意花鸟画、山水画技法，笔墨掌控和色彩处理，及至题跋的运用等等。他全身心扑在书画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三更灯火五更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绘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作品随之蜚声水乡。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画家，张省自然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他专注于画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跋山涉水，饱览祖国自然美景，开启写生之旅，激发创作灵感。同时，专心研习历代名家名画，从画史画论中汲取养分；到国内外著名博物馆、艺术馆考察、观摩馆藏中国名画，拓展视野。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反复锤炼绘画语言，精勤探究表现形式，从而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新世纪初，张省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南下羊城，应邀出任广州大学松田学院艺术系主任，走进人生又一个驿站。“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却无意中深化了他倡导的“画学”观，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窗。



又是一个江南春（国画）张省

弗兰德公路的转弯处

金桔芳

的部队受命参加“迪尔计划”。按照该计划，一旦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被破坏，法军就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预定区域（那慕尔-色当西部），同时将一部分兵力调往比利时默兹地区东部以便拖住德军的火力，确保大部队能有时间到达部署地点。这项战略顺利实施的前提是阿尔登地区必须能顶住敌军的装甲大部队，并且德国人无法跨越默兹河。它同时决定了作为前锋的部队军种是一部分机械化部队和大量的骑兵部队，也决定了将要展开的军事步骤。然而，事实和法国人的预想大相径庭。德国人并没有重复一战中曾使用的“施里芬计划”先攻占比利时，而是在1940年5月出其不意集中火力直取比利时城市那慕尔以南的法国色当。法军对此毫无防备。然后，西蒙在一次访谈里形容道，就像“房梁倒塌后压在胶合板上”一样，德国人的飞机和装甲车彻底破坏了法国人的军事战略，造成了法军自1870年阿金库尔和色当战役之后最惨重的失利。

从西蒙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与这一段历史的交汇是这样的：5月10日，为了抵御德军在比利时方向的进攻，西蒙所在的龙骑兵第三十一团随第九军第四轻骑师北上与德军交战；次日，第三十一团骑马渡过默兹河，但在德军装甲师和战斗机的攻击下节节败退；5月16日，第三十一团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西蒙侥幸逃生并试图找回大部队；他在路边遇到了第三十一团的雷上校、第八团的古尼

上校和三名士兵，并跟随他们走上了那条死亡的乡间小道；数小时后，他目睹了雷上校被德军狙击手击毙；次日，西蒙被俘。

从出征到被俘，前后不过短短八天，就好像一阵电光火石之后，骑兵连不复存在，昔日的战友、日夜相守的战马，一切都灰飞烟灭，西蒙的战争生涯也仓促地结束了。整整七天中，他没有发射过一颗子弹，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在飞机、大炮、装甲车和机关枪组成的敌方对骑兵部队实力悬殊的碾压下，他们就像猎场上的野兔，只有仓皇逃命的份儿。随后，西蒙被送往位于勃兰登堡南部米尔贝格的战俘集中营，经历了饥寒交迫和劳役繁重的五个月，于同年10月被转移到法国朗德省的战俘营，并于10月27日成功越狱，返回母亲的故乡法国南部自由区的佩皮尼昂隐居。自此，如他在《刺槐树》中所说，“某种看不见的墙，某种无法弥合的断裂”横亘在记忆和现实之间，纯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回到法国的西蒙经历了长时期的低落。1940年5月16日的这场血腥的战役（或者屠杀）日日夜夜在他的心头萦绕，而原本自认为有去无回的他竟然侥幸逃生，心里升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隐隐的自我谴责。他试图弄明白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但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这大于人类意志的一切又怎么搞得清？他想要书写这段经历，可是怎么书写呢？书写意味着一种秩序的重建，而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却毫无秩序可言……在不

可言说的大写的历史面前，作家失语了，文学陷入了悖论。

1941年，西蒙完成了在战前就开始的处女作《作弊者》，但那还不是他所想要的风格。据他自己后来所说，那还只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对于传统文学的模仿。如何来呈现那段战争的记忆呢？这个问题在他心中横亘了近二十年。直到五十年代末写完《草》之后，西蒙在午夜出版社社长杰罗姆·林东的陪伴下去往埃特雷塔。车行半路，来到一个公路转弯处，满目翠绿的枝叶扑面而来；就在那个时候“整部小说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后来他向《快报》记者这样说道。接着，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摸索出一种写作方法，用同时性的方式将一切回忆铺陈在小说之中；也就是说，用一本小说去再现脑海中包罗万象的一个瞬间。

他做到了，那就是《弗兰德公路》：骑兵队长挥舞大刀，中弹后如熔化的铅兵一般直挺挺倒下的画面成为了整部小说的母体，在小说中回环往复，是主人公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一中心画面引发了各种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回忆，以及回忆中嵌套的回忆，各色片段互相穿插，鱼贯而现。创作时，西蒙先写下一些碎片式的片段，再串成一个提纲，并将不同的主题和人物用不同的颜色加以标注。然后，他以画家的眼光，将不同的色块随意调配，看看哪里还缺一点红色，哪里还缺一点绿色……最终，弗兰德公路的故事以其原始的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初读的读者会觉得难以适从，因为它与传统的遵循时间顺序和因果链条的小说大相径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谁在回忆，究竟哪是事实，哪是猜测，哪里又是纯粹的臆想。但所有的一切又是如此流畅，如音乐般倾泻而出，如颜料般色彩缤纷，读者可以从随意的一页翻开，也可以在下一次阅读时再随意翻开另一页，因为它遵循的是意识流的秩序，是文字相互吸引和耦合的秩序，是诗与画的秩序。

他从水乡走来

茅 濂涛

斯所说，“画是一种无声的诗，诗是一种有声的画。”静止的画面，化成波动的音乐，无声的画达到了“有声”的艺术效果，为作品增添了多少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深邃的意境！

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大凡能打动人心、感染人的艺术作品，总是反映或表现了艺术家鲜明、强烈、深刻的感情的。没有感情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品。

山水是诗人、画家抒发情感的媒介。中国画和诗，许多都是以山水境界作为表现和咏唱中心的。张省的山水画之所以打动人心、感染人，就在于画家灌注在作品中炽热、滚烫的情感，展示了真诚、暖心的故乡情怀、祖国情怀。

悠悠天宇旷，浓浓故乡情。张省的山水画作品中，冠之以“江南”的不可胜计：《江南水乡》《江南四季》《江南十月》《春风又绿江南岸》《又是一个江南春》……江南是画家的故乡，生命的摇篮，记载着他的人生轨迹。因此，他将对故乡的满腔热爱倾注笔端，绿树浓荫、小桥流水、渔舟往来、明月高悬的江南美景一挥而就。鲜明的江南特色，明快清新的意境，浓郁的生活气息，无不寄托了画家的悠悠乡情。“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家与国相连，故乡情连着家国情。在张省笔下，故乡情、祖国情是一脉相承的。你看他的《江山如此多娇》图：耸峙的山峰，缭绕的白云，喷薄的红日，奔腾的大江，参天的古木……开阔壮观的画面，情景交融的境界，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我们在欣赏这幅画时，不但感知着作品所描绘的自然景物，而且感受着寓于景物中的画家情感体验：高耸

入云的山峰，不正是巍然屹立、英姿勃发的新中国巨人吗！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祥云开，不正是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象征吗！

作品寄寓了画家对祖国母亲的一片深情，也是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珍贵礼物。观众的心弦被画家的情感所拨动，不知不觉进入了情景交融的境界。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也。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常州画派鼻祖恽南田说：“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者不生情。”张省饱蘸深情，纵览祖国崇山峻岭，大江大河，登黄山、游泰山、上井冈山、越秦岭、过三峡，跋山涉水，旅行写生，大大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素材。景物激发联想，联想引起移情，他欣然命彩笔，尽情描绘祖国大好河山。中华五岳、茫茫沧海，长江、黄河、水乡、古镇……无不栩栩如生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观者寓目难忘，心驰神往。刘海粟大师叹曰：“张省创作的国画，是在为中华山河立传。”

艺术画卷陈列的作品，除山水画之外，还有一部分花鸟画。花鸟画中，当以葡萄画最抓人眼球。枝蔓苍劲的葡萄藤，晶莹剔透的葡萄珠，或累累垂下，或装满提篮；紫色的、青绿色的、乳白色的，似翡翠、像玛瑙。立体晶莹，鲜活滴翠，天然情趣呼之欲出。

张省在葡萄画创作中，将传统水墨与西画色彩有机融合，吸纳西画中透视和光影表现手法，运用色彩浓淡的变化，并在葡萄中间留出高光点，且工笔兼顾。由于采用这种独特的方法，珠粒饱满、鲜嫩水灵，具有半透明质感、光感的葡萄，惟妙惟肖，跃然纸上，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昭示丰收喜悦和吉祥如意的葡萄，是花鸟画的常年题材。张省历经多年探索、实践，练就一手“绝活”，形成独树一帜的葡萄画，故有人将他称之为“张葡萄”。

艺术馆悬挂的多幅古文字，引起观众浓厚兴趣。张省向我介绍，汉字是历史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文字家族中最老的寿星。远古人记录一种事物，首先是图其形。最早的文字是图像化的，最早的绘画是具有文字意义的。我画画数十年，常常一边挥毫泼墨，一边神驰遐想。一次，突然由“书画同源”联想到中国古文字与绘画的同一性。于是，他萌发了揭开“同源”密码的念头。

张省开始广泛收集古文字遗存，那些远古时代散落各处的古文字，包括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岩画。他大胆地设想将现实生活中所用的文字，即尚在“服役”的一万余字用古文字写出来，转化为“形像”。

寒来暑往，春风秋雨。一部超过万字、洋洋大观的古文字图录《与远古对话》终于问世。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高度评价这是“一部独立独行、无限美妙的书法巨作”。这部“远古象形神书”，是张省几十年心血、智慧的结晶，也是他深耕画苑、触类旁通的“副产品”。难怪著名画家范曾先生称赞他是一位集书画、美术史论于一体的多才型画家了。

从水乡走来的画家张省，如今拥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级美术师、广州大学终身教授等多种头衔，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三十余次，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张省著作四十多种，其作品曾作为礼品赠送给外国元首。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新加坡电视台等分别对他做过专题介绍。文化部曾于2005年授予他“优秀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家乡政府为他建立了美术馆、艺术馆，更是昭示了最高荣誉。

以世俗之见衡量，张省可谓名闻遐迩，功成名就，可以享清福了。张省却认为，生命有终点，艺术无止境。“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惟有永怀追求的理想，永不满足，砥砺前行，人生才是充实而有意义的。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